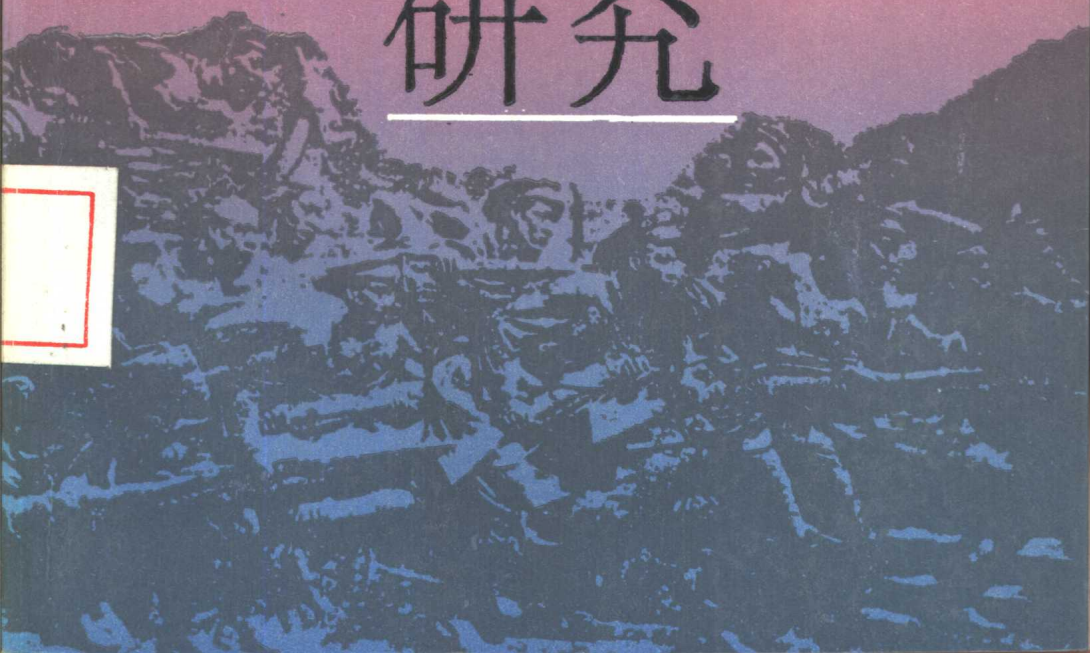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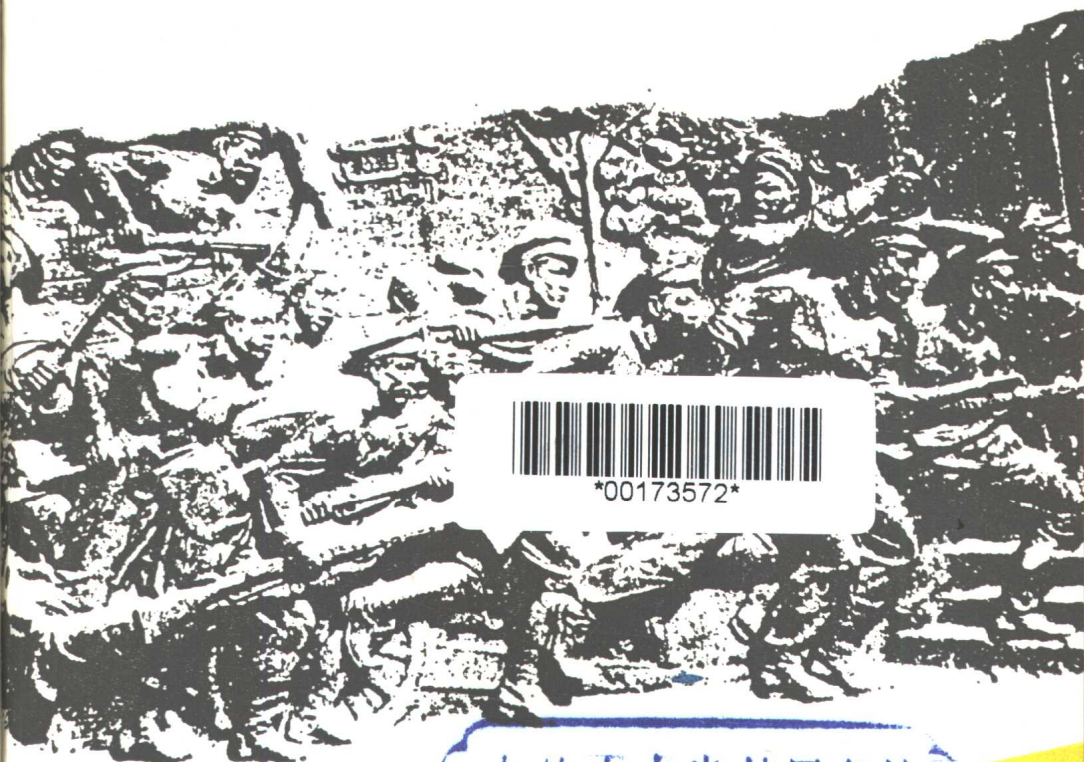


中国 近代 伦理 思想 研究

徐顺教
季甄馥
主编





00173572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登录号 827865

书号 B82

X67 5

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研究

徐顺教 季甄馥 主编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研究成果

(沪)新登字第201号

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研究

徐顺教 季甄馥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25 插页: 2 字数: 360 千字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本

ISBN7-5617-0909-9/B·054 定价: 17.60 元

顾问：冯 契

主 编：徐顺教、季甄馥

撰写人员和分工(按姓氏笔划为序)：

冯 契	代绪论
何锡蓉	第一章 第一、三节， 第二章 第一、二节， 第七章 第七节。
李似珍	第三章。
杨 芳	第七章 第六节。
张 癸	第七章 第八节。
汪海萍	第四章 第二、三节。
郑克强	第四章 第一、四节。
周昌宗	第七章 第三节。
季甄馥	第六章 第二、三、五、六节， 第七章 第一节， 第八章 第一、二节。
徐顺教	第五章 第一、二节， 第六章 第一、四节。
高振农	第六章 第七节， 第七章 第四节。
高瑞泉	第一章 第二节， 第七章 第二、五节。

代绪论

关于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

就象政治学说史不同于政治革命史一样，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史主要是阐述近代伦理学说的演变、发展，而不是讲道德变革史。伦理学说是人们的道德生活、伦理关系和道德品质的理论表现，其中也有关于道德革命的学说，但不是讲道德生活的变革过程本身。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引起人们道德生活的变化，这些变化如何反映在伦理思想、伦理学说中？近代不少思想家倡导道德革命，提出近代伦理学说，是不是客观上引起道德革命，即引起社会伦理关系、人们的道德品质的变化，或者说在什么意义上引起了变化？这都是要认真研究的。

下面谈谈与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史研究有关的五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近代价值观的变革。中国近代哲学革命为政治革命作了准备。近代哲学革命主要在历史观和认识论上表现出来，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提出，对认识论上的存在和意识的关系、历史观上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作了科学的规定，这标志着哲学革命的一个飞跃。但近代哲学革命还包括另外两个方面：第一，思维方式的革命，即逻辑思想和方法论的革命，要求用科学方法

取代古代的经学方法,用自由讨论代替独断论。在这方面,中国近代哲学家作了很多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没有得到总结,尤其是对经学方法清算不力,后来有人甚至披着革命的外衣来贩卖经学方法,以至在十年动乱期间,个人迷信代替了民主讨论,引证语录代替了科学论证。其次,价值观的变革。这方面的情况更差。价值观变革集中表现在新的社会理想和新的人生理想要求用近代的自由原则取代权威主义。封建的权威主义可以追溯到孔子的“三畏”。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大人就是社会的统治者,圣人之言就是经典里的训言,圣人在经典里讲的话就是权威。大人和圣人都自称是天命的代表,权威主义就是以天命为根据的。价值领域的权威主义还表现在纲常名教中。“三纲”就是要求在下者服从在上者的权威。在近代,价值观的革命也没有得到总结。价值观的变革虽有成绩,但并不大。个人迷信就是迷信权威,群众没有自由。如果自由原则得到盛行,也就没有个人崇拜了。所以近代哲学革命有成绩,而在价值观的变革方面,却是很差的。

价值观就是人类创造的文化,文化的核心就是价值。怎样叫作创造了价值?即人提出理想,并通过社会实践,使理想化为现实,这就创造了价值。一切创造就是创造价值。文化就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人的各种创造。所以价值观依赖于社会实践,价值观的变革是受社会的演变、变革制约的。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里所说,人类社会结构随社会的变革经历了三个阶

段或三个形态。最初的形态是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人的依赖关系”最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在自然经济基础上从氏族部落的纽带演变为家长制、以至后来进一步形成奴隶制、封建等级制。这阶段的价值观反映了“人的依赖关系”、即在下者对在上者、奴隶对奴隶主、农奴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所以价值观就集中表现为孔子讲的“三畏”，权威说了算。第二阶段，是以商品经济为主的社会，这种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为特征。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工人自由了，对人的依赖关系解脱了，成为自由的、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或雇佣劳动者。人的独立性代替了人的依赖关系，可是对物的依赖关系却发展了。人的独立性建立在对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上，这与过去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有很大的不同。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发展缓慢，人的生产能力是在很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而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形成了普遍、全面的社会物质交换关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发展起来。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共产党宣言》）人的才能也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但商品货币关系（本质是“人的关系”），却作为“物的关系”以一种凌驾于人并且支配人的命运的强大力量出现在人们面前，因而在对物的依赖的条件下，产生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拜金主义），造成对人的新的束缚。从异化现象

来看,在第一阶段,即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异化现象主要表现为权力迷信,在上者有权力,要依赖它,它处于超经济的地位。第二阶段,即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异化现象主要表现为商品拜物教、拜金主义。既然社会有异化,可见人还没有真正自由。马克思运用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来考察人类社会的过去和未来,指出人类社会的未来必然是共产主义。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阶段。在第三阶段,既摆脱了直接的“人的依赖关系”,也摆脱了“物的依赖关系”,人能够完全自由地支配社会生产过程和自身的生活过程,人的能力真正得到了自由的、全面的发展。这个阶段是以“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为特征的。人们的社会关系将采取自由人联合体的形式。在联合体中人们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关系。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讲的:“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即是共产主义社会,真正自由的社会。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才真正获得了自由,进行自由的劳动。所以要从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变来考察价值观的变革。

中国近代价值观的变革如何呢?中国近代经历了伟大的社会革命,与此相联系,开展了哲学革命,包括价值观的革命。从社会历史演变来说,中国近代经历了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革命转变,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权威主义的价值观成了革命的对象。出自封建的依附关系的权威主义是束缚人、奴役人的网罗,近

代先进的思想家都要求个性自由，反对和批判权威主义。近代伊始，龚自珍提出“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标志着近代“自我”开始觉醒，反映了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人的独立性的要求，这是近代价值观根本变革的开端。其后，谭嗣同主张“冲决网罗”；梁启超大声疾呼要求“除心奴”；严复讲“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章太炎强调“依自不依他”，“自尊无畏”。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都强调个性解放、个性自由，反对权威主义的价值观，胡适也对权威主义持批判态度，要求“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由于近代中国遭受外国帝国主义的欺压，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以近代中国革命不仅反对封建主义，而且首先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资本主义没有得到顺利发展，与反帝的民族民主革命相联系，却较早地掀起社会主义运动。洪秀全重新提出大同理想，康有为写《大同书》，孙中山讲“天下为公”，也是讲大同。“大同”是旧的观念，但中国近代的大同理想是一种崭新的社会理想。最大的区别在于，过去讲大同，认为理想社会是在远古，是复古主义；近代讲大同，认为理想社会不是在远古，而是在未来，它指引人们为未来的社会而奋斗。这是哲学思想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近代强调理想在未来，在康有为那里是以进化论原理作根据的。孙中山也是这样。

在近代，一方面提出个性解放的人生理想，另一方面提出大同的社会理想。个性解放的理想与封建时代的做圣贤是不同的，近代的大同社会理想与古代《礼运》里讲的

大同也不同。这两种理想或价值观的变革就是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要求个性解放,社会主义要求实现大同理想。五四运动以后,迎来了马克思主义。回顾前一段历史,李大钊作了总结。李大钊依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开始把大同理想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上,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他说,近代有两个运动:一个是个性解放,即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运动,另一个是大同团结,即社会主义运动。“这个个性解放运动,同时伴着一个大同团结的运动。这两种运动,似乎是相反,实在是相成。”(《平民主义》)他强调“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这里,李大钊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观念: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的统一、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统一。在李大钊看来,这也就是共产党人的理想。这是符合《共产党宣言》所说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的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当然李大钊讲的还是很朴素的,但他提出了一种新的价值观,这种新价值观也体现在鲁迅所说的觉悟的知识者、革命的先驱者的理想人格上。鲁迅在《门外文谈》中说:一个先驱者应既有清新的理智,又有坚毅的意志;既有明确的群体意识,又有明确的自我意识;既有独立的人格且自尊,同时也尊重别人;他处在领导岗位,他也用权,却不以权谋私;善于引导群众,但不迎合;他始终是大众的一员,这样的人格就是体现了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相统一的

人格。李大钊、鲁迅、瞿秋白等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共产主义者确实提出了新的价值观，也可以说是继承和发展了龚自珍、洪秀全等先进人物的价值观的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始。正因为有这种新的价值观，无数的共产主义者忘我地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许多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革命者之间体现了个性解放与大同团结统一的精神境界。在这时期，中国民族精神显出长江黄河那样的雄健气魄，这在很多革命者身上得到了体现。但这些成就在理论上没有得到总结。

由于来自共产国际“左”的影响，从三十年代开始有一种偏向，教条主义者把阶级观点绝对化，把个性解放看成是资产阶级的要求。毛泽东1944年8月31日致秦邦宪的信中说：“……个性解放，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他在《论联合政府》中又说，我们主张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正是“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这些话都很好。可是后来他把这些话都忘记了，这就产生了比较严重的情况，在个人崇拜下，权威主义、经学方法变相地复活了。所以虽然中国革命取得伟大成就，民族解放运动、民主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后来在实践上有失误，以至发生“文革”那么大的灾难，国家遭到很大破坏。从价值观来说，为什么原来新的价值观提出来，许多革命者为之奋斗，在他们身上得到体现，后来则不行了？尤其是在“文革”中，民族的素质下降了、倒退了。这需要大家来认真总结

教训。

价值观与科学、生产力不同，科学、生产力被破坏了，还是容易恢复，再会前进的。价值观就不是这样能一直往前发展，在价值这个领域，当传统的价值观被抛弃了，新的价值观又确立不起来的时候，许多人就彷徨不知所措，就会形成对价值的失落感。这个时候给人的感觉是道德败坏，不是前进，而是倒退，一切坏的东西都会出现。正像希腊神话中的潘朵拉的盒子，一打开，所有坏东西都飞出来，只留下“希望”被关在盒子里；或如庄子讲的邯郸学步的故事，故步失去了，国步未学会，只好匍匐而行。中国近代经历了多次反覆，有革命高涨、道德向上的时期，也有道德败坏、形成价值真空的时期。在封建社会稳定的时候，总有一套价值观维系着，可是在近代，有时显得蓬勃发展，有时却似乎完全失控了。

第二个问题：义和利的关系。义利之辩是伦理学中的重要问题，从古以来就争论这个问题，近代则继续探讨这个问题。在戊戌变法时期，有些人比较多地讲功利，如严复把英国的功利主义介绍到中国来，把利归结为快乐。他讲的功利主义是合理的利己主义。近代义利之辩与群己之辩结合在一起，强调个性解放。“利”首先就是个人利益。近代的功利主义与古代的有所不同（古代如墨子也公开讲功利，他说：“义，利也。”他把道德价值归结为公利，或天下之大利。墨子讲兼爱，要爱人如己，使得人人能免于饥寒、痛苦，过快乐和富庶的生活。墨子还讲“尚同”，他不重视个性。）。近代另外一些人则不讲功利主义，认为把功

利归结到个人苦乐,是为利己主义辩护,如章太炎就反对功利主义而强调道义。但章太炎讲道义论,强调“依自不依他”,也强调个性解放。章太炎和严复都重视个性,但章太炎认为献身革命和民族解放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不是出于利己。这个争论到五四时期还继续着。陈独秀讲功利主义,李大钊讲理性主义,后来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在资产阶级学者中,如胡适讲功利主义,从实用主义观点讲个人主义人生观。梁漱溟鼓吹变相的中体西用论,讲伦理本位,旧的色彩较浓。当时争论人生观的问题,归结起来实质上是义利、群己之辩。

马克思主义者从唯物史观出发提出革命的功利主义,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基础,这并不是说道德不重要。但马克思主义者对义利关系问题在理论上也没有解决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民大众的利益是基本的,但人民大众的利益又不能离开个人,所以应该把集体利益、群众利益与个人利益结合起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道德为了人民的利益,道德是工具,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手段。但手段和目的可以转化。真善美这些精神价值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自由表现和发展,也是目的。德行本身就是目的,人的德性、素质的提高本身就是目的。所以道德作为工具与道德作为目的的辩证关系这个理论,是应该认真地加以探讨的。由于伦理学本身的理论没有很好总结,所以常常偏来偏去,尤其是后来,把阶级观点绝对化,把道德与政治捆在一起,强调道德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只强调工具的一面),就忽视了道德是目的,每个人有独立人格也被忽

视了,道德成为强加于人的工具。片面强调道德的工具意义,道德就成为束缚人的桎梏。这样一来走向反面,就成为道德的虚无主义,或道德的实用主义。五、六十年代,政治挂帅、思想政治教育强调到极点,可是现在有些人却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只讲利,讲短期行为,眼前利益,其他什么也不讲。所以正确阐明义和利的关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个问题:理智与意志的关系。道德行为涉及理智与意志、自觉与自愿的关系。中国正统派儒家强调自觉,强调道德出于理性认识。强调自觉的原则虽然是重要的,但是正统派儒家却忽视了道德上的自愿原则、意志自由的原则。近代的观念有了变化。从龚自珍开始,强调“心力”,道德行为要以自由意志为前提。严复和章太炎在伦理学上虽然有功利主义和非功利主义的对立,但他们都肯定每个人有独立人格,都强调意志自由,强调道德行为要出于自愿原则。只有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才有责任感,在言行中就必然是“言必信,行必果”。可是孔孟则认为这并不重要。孔子讲“言必信,行必果”,是“硁硁然小人哉!”严复、章太炎都批评孔子这句话,这是自由原则与权威主义不同的地方。个人有独立人格、自由意志,对自己的言行就有高度的道德责任感,这是自由意志的表现,这也是后来新文化运动中许多进步人士共同的观点。当然,意志自由强调过分,就会导致唯意志论。近代从龚自珍开始,唯意志论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谭嗣同、章太炎、陈独秀以及早期的鲁迅等许多进步思想家和革命者都有唯意志

论倾向。这是因为中国近代要反对道学家的宿命论和理性专制主义,同时政治上要解放,要自由,要实现大同理想,就必须去斗争,就必须发挥意志力量,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以许多人强调斗争,强调意志自由,强调要发挥意志力量,这就容易导致唯意志论。这与中国古代不同,中国古代没有一个强大的唯意志论传统,真正的唯意志论较少。但是唯意志论又会引导到盲目行动。实用主义有唯意志论倾向,尼采哲学的唯意志论直接引导到法西斯主义。因此到了二十年代后期,革命者反对唯意志论,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也改变了提法,如梁漱溟后来用理性代替了意欲,熊十力讲生命哲学,后来他也批评唯意志论。

就道德领域来说,既要求自觉,即遵循理性原则,按理性认识办事,又要求自愿,即出于意志的自由选择。如果意志不是自由的,那就谈不上道德责任。自觉是理智的品格,自愿是意志的品格。在道德行为中理智与意志、自觉原则与自愿原则应该是统一的。古代一些大哲学家都有这个意思,如孟、荀、柳宗元、王夫之、黄宗羲等。在近代,这个问题特别突出了,却没有从理论上加以很好的总结。

道德理想需要通过自觉自愿的活动,达到理智与意志的统一才能实现。理智认识它,意志自由来执行,道德理想、道德规范通过实践得到贯彻、实现了,现实化的结果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社会伦理关系的变革,另一方面是个人道德品质的提高,即人的品德的提高。

第四个问题:关于社会伦理关系。道德理想的实现就是要建立一种合乎道德的社会伦理关系,如学校中要建

立尊师爱生的伦理关系，企业中也要建立一种合理的互助合作关系，等等。如果社会各个方面都建立起一种比较合理的社会伦理关系，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有一种道德的凝聚力。一个社会组织真正有一种合理的伦理关系，善行就会到处涌现，这个社会组织就会有道德的凝聚力。在近代，如抗日战争时期以及共产党领导人民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道德凝聚力就表现得很突出。在五十年代初期社会中也具有这样一股强大的道德凝聚力。当然，伦理关系有很多层次、很多方面，如学校、家庭、企业，等等，是很复杂的。道德行为就其内容来说，就是巩固和发展人际关系，使社会组织具有道德凝聚力，在形式上则是要有文明交际方式。封建礼教要批判，但文明礼貌、文明的交际方式在任何社会都是需要的。社会主义也要用“礼”来调节人们的关系，要讲文明行为、文明礼貌。过去讲“礼”有“节”和“文”的双重作用。“节”是节制，就是说对人的情感、欲望、意愿有所节制。“文”是文饰、美化，就是说，讲礼貌、仪式、礼节，对群体对个人的行为有美化、艺术化的作用。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高不高，要看人际关系中的道德凝聚力，也要看有没有文明礼貌。这些问题在近代探讨得很不够。

在社会伦理领域，道德和法的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古代有礼法之争、德力之争，即道德和法之争。近代也比较注意这个问题。要民主就要法制，民主制度下的法要保护人民，贯彻道德原则，但法与道德又不同，道德约束与法律制裁不同。法有外在的强制力量，而道德则诉之于社会舆论和个人良心的约束。法对敌人是暴力，只有

当敌人放下武器，才不采用暴力；国民违反法令也要受处罚，这就是法的制裁。但是人民的法律，应该贯彻道德精神，体现人道原则。毛泽东关于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可以说在原则上解决了道德和法的关系，但在实际上，既没有建立完备的法制，也没有很好研究道德的特殊性，认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道德则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了，所以并没有真正解决道德与法的关系。在革命时期，把旧的法制破坏了，人民的道德的凝聚力加强了。可是五十年代以来，一次一次的批判斗争，以至发展到“文革”，法的制裁被藐视，道德凝聚力遭到大破坏，这是个悲剧！

第五个问题：道德品质的培养。伦理学说包括道德品质的培养，更根本一点，就是理想人格的培养。近代与古代不同，提出了培养新人的要求。古代儒家要求把人培养成圣人、贤人，并且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这种说法包含了对人的尊重，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他们不是培养平民化的自由人格。近代思想家提出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来取代封建时代的圣贤，观念上与过去不同。龚自珍强调众人自作主宰，他以为不论是皮匠、木工，还是冶金工人，只要是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劳动者，就都是“天下豪杰”。后来梁启超写《新民说》，以为民众之“自新”在于既养成独立自主之人格，又树立国家、群体的观念。显然，他们的理想人格已经平民化了，不再是高不可攀的圣贤。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如何培养？龚自珍提出“各因其性情之近，而人才成。”（《与人笺五》）